

“中国话语”应该如何建构

□ 陈曙光

故事”举世流传,“中国崛起”已成事实。“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不能再继续了,“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一句话,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

复归路向、复古路向、西化路向,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合适方案

中国话语建构,事关中国的道路自信,事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事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是,究竟该用一套什么样的话语来阐释“中国道路”,这似乎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构成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可回避的,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性反思都在考验我们: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有人提供了这样三套方案供我们选择。这些方案中,有的是我们自己习得的,有的是祖宗留下的,有的是别人“慷慨赠送”的。

第一套方案是教条主义者推崇的方案。他们认为,马恩的话语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体系,它自创立以来始终参与了世界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马恩的话语即是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即是回归马恩的话语。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标新立异,为什么不可以“照着说”——这是“回到原典”的复归路向。

第二套方案是文化保守主义(历史复古主义)者迷信的方案。他们以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绵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古韵的经典话语,这套话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复兴”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词汇作为时代的主轴,作为继续前行的梦想和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是“向后看”的复古路向。

第三套方案是文化激进主义(洋教条主义)者主张的方案。他们提出,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在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话语,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是在西方话语的主导下推进的,西方话语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中心话语,西方模式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什么不能向西方话语靠拢——这是“向外看”的西化路向。

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种可能的方案呢?

首先,马恩的话语依然管用但不够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以“老祖宗”的话语来解决21世纪中国的问题。老祖宗的话语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老祖宗的话语在今天依然好用,依然能用,依然管用,但

是,今天的中国是马恩未曾遇到过、也未曾设想过的中国,马恩的话语不够用也是事实。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归马恩的经典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身处在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和文化传统之中。

其次,古人的话语过去好用今天不完全管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民族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以古人的话语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是在古代中国这块沃土上生长起来的,蕴含了厚重的东方智慧,这套话语不仅缔造了“中央之国”的神话,也深刻影响了东方诸国的文明步伐。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置身于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发展大道,不能依靠退回前现代来寻求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活传统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已无法退化到前现代。

再次,洋人的话语西方能用中国不适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民族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期待以西方的话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今天遭遇的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在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但是,由于国情不同,“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文化激进主义者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人,这也是一种“文化软骨病”。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言,恐怕只能起到“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作用。

可见,“回到原典话语”的复归路向,“复活传统话语”的复古路向,“套用洋人话语”的西化路向,都无法科学解释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乃至即将发生的故事,都无法准确破译“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因而也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正道。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

中国话语的自立自强是实现“三个自信”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如果缺乏“中国话语”的有力支撑,那么“中国道路”就是不清晰的,“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我们必须要在成为行动巨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语言上的巨人。

但是,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发声?中国话语究竟该说些什么?该怎么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

“中国话语”不仅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前因”,还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后果”。“前因”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果”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

验、人民的检验,具有实践的合理性。

“中国话语”不仅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做法,而且还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方法。做法是操作层面的,方法是理论层面的;做法是形而下的,方法是形而上的;做法是特殊的,方法是普世的;做法不能复制,方法可以借鉴;做法往往过去时,方法则常用常新。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则是普遍适用的方法;建立“经济特区”的做法是属于中国的,但其间蕴含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则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话语”不仅要讲清“中国经验”的民族性,还要讲清“中国经验”的世界性。“中国模式”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是,“中国模式”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出口”到世界,中国从来不搞模式输出,从不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统治世界。“中国模式”无法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丰富了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智慧,提供了破解发展难题的灵感和启发,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话语”不仅要描绘“中国故事”,还要解码“中国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其他话语无法解释,对于“中国奇迹”,中国话语要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不仅要从事业改革的维度来解释,也要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维度来解释;不仅要从经济领域来解释,也要从政治和制度的层面来解释;不仅要从中国纵向比较的视野来解释,还要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解释。

“中国话语”不仅要揭露西方预置的话语陷阱,还要敢于与西方话语过招。西方话语中预设了太多的理论陷阱,比如,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西方制度“包治百病”的陷阱;“普世价值”的陷阱;价值外交的陷阱;民主和平论的陷阱;霸权稳定论的陷阱;民主富强论的陷阱等。西方通过话语霸权为全世界布下了一个美丽的陷阱,等着别国就范。这方面的“试验田”已经太多了,中国没必要成为又一块失败的试验地。此外,在国际话语场,西方一些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制造了一拨又一拨的话语,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大国责任论”,“非洲殖民论”,“南海航行自由论”,等等,中国不应该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应敢于接招,敢于亮剑。

“中国话语”不仅要破译中国奇迹的密码,还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中国话语首先带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想象,但无疑也会体现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比如,改革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的改革举措无法复制,但其间蕴涵的改革方法论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硬道理”,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根据自身实际实行渐进式改革,“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加强顶层设计”,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的中国方案。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娱乐至死的网络直播

□ 刘朝

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休闲娱乐,已经在消费他人或自身“隐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对公德、尊严、文明却越来越漠视。

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比尔·盖茨这一论断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在此过程中,生产、生活乃至休闲娱乐方式都被“一网打尽”,人们不光习惯利用网络购买日常物品,还依赖网络打发闲暇和无聊。网络不断“发明”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近期不断引爆舆论的“网络直播”便是近年来的代表。经历网聊、网游、论坛、贴吧等方式后,现在的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网络直播”。

实际操作中,“网络直播”实际不复杂。当事人依托某一网络平台,凭借自身的专长、口才、美貌甚至“卖萌耍贱”,“秀下限”,和网友进行互动,就可以在“直播”一期“节目”随着“直播”行业的疯狂发展,除了“传统”的网游直播、音乐直播,当下的“直播”内容已五花八门,匪夷所思,吃饭、睡觉及个人隐私皆可“直播”,甚至一些涉及色情、暴力的内容都能堂而皇之地登上“直播”。近期发生的某男“主播”两次在校公然骚扰女生,在大街上公然骚扰女性并漠视法律、出言不逊,其粉丝反而在网上辱骂受害者,使“网络直播”乱象再次引起舆论强烈关注。

“直播”乱象直接反映了互联网娱乐在缺乏有效监管环境下呈现的无序生态,也折射出广大网民在互联网休闲娱乐时代的吊诡心态。在旁人看来,这些无聊的“直播”竟能导致痴迷、引发消费,成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真是难以理解。但是,在社交网络、炫耀性消费和粉丝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充满感官刺激和荒谬逻辑、挑战道德、蔑视规则的庸俗文化确实正在泛滥泛起。

互联网能够快速有效地帮助个人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起自身的“熟人”社会网络,并融入不同的“同好”群体,形成一个个虚拟社群。虽然网络社群成员之间共享特定的文化符号、互动方式和价值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约束,但在实际互动过程中,依然会“重视”现实社会交往的方式: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成员,即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一般都会成为社群领导者,引领社群发展,并能进一步将这些网络资源转化为现实资源。因此,赚取更多社会资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网络世界人际互动的内生动力。

在信息触手可及的网络世界中,社会资本实际等同于更多的关注者和点击率。获取关注的途径主要有三:借助事件炒作成为“网红”,与“网红”搭上线,有互动,或通过夸张的炫耀性行为博得“曝光率”。因此,人人都热衷于各类媒介“晒”自己,赢取“点赞”。对于普通人,展示强大的消费能力无疑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显示自身的社会资本,特别是一件物品或“荣誉”越稀有,似乎就越能体现购买者的财富和地位,就越受到追捧。在曝光的“网络直播”事件中,就有网友花费12万元,只为获取“直播间”所谓的“国王”头衔。

在“网络直播”这场盛宴里,陆续出道的“网络主播”们为赚取更多关注,迅速蹿红,不惜物化自身,狂秀“下限”,用尽各种手段吸引眼球,“搏出位”;广大网民为了与“主播”进一步互动,不惜花费大量金钱进行赤裸裸的追逐和炫耀,试图展示自身的网络地位和社会资本,满足心理需求。而“网络直播”公司,则充分利用广大网民与“网络主播”的互动进行谋利,一方面绞尽脑汁开发各种“直播”内容,将一切都尽可能娱乐化;一方面开发各种虚拟的新奇物品,如虚拟豪车,虚拟婚礼等,鼓励网民进行各类炫耀性的消费。

目前,“网络直播”为代表的休闲娱乐,不管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都已经在消费他人或自身“隐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可以发现,人们不光喜欢以消费“他人”为乐,也习惯了暴露自身以博取关注,对隐私、公德、尊严、文明却越来越漠视。当下的互联网休闲娱乐生态,正越来越接近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的描述:“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不过,有人却还在为“网络直播”鼓与呼,认为这种方式通过打擦边球,很好地发展了所谓“荷尔蒙经济”,是通过适当地“把握”和“刺激”人的欲望而合法地赚钱。但是,网络直播间虽然只是一个小空间,却通过互联网连接着社会这个大舞台,构建起了一个个传播网络,也因此具备了一定的公共属性,如果放任其“娱乐”下去,只会让其不断僭越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的底线,持续恶化互联网生态,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引爆社会事件的定时炸弹。

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面对以恶俗“网络直播”为代表的为恶的网络媒体,仅靠网络主播、网络直播平台的自律来实现自我净化恐怕只是痴人说梦。当务之急,是制定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出台更加细致的管理办法,构建对应的执法管理体系,明确“有所为”和“不能为”;同时,还应着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引导网络休闲娱乐逐步向健康发展,不断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政协研究室)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檬

绿色发展需要一种民众自觉

□ 邱耕田



我们每个人,可能既是“公地悲剧”的制造者,同时又是“公地悲剧”的受害者。

在推进社会发展的主体中,政府和企业和民众是基本的主体形式。但在不同的发展实践中,不同的发展主体其作用不尽相同。就我国的五大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而言,有的发展更多需要政府的力量,有的发展更需要企业的参与合作。而唯独绿色发展,既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力量,更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可以说,绿色发展充分体现着“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人民主体地位原则。

关于生态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公地悲剧”理论应该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哈丁提出来的。众所周知,人们赖以生存的众多自然资源如荒地、草场、水域、矿山、森林等具有“公地”性质,即某一特定的人群都是“公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这样,人们一般会采用两种不同的心态来对待“公地”:其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指只受益不承担)的心态;其二,“反正是公地,我不用人也会用”(自我中心)的心态。正是在这两种心态的支配下,人们往往会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化公为私”,直到“公地”被彻底破坏从而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当然,“公地”之所以产生“悲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地具有稀缺性。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日趋短缺,为了

吸,为何我不买呢?基于这样的认识,买车人最后基本都选择了买车的自利行为。在我们身边,可能很少有人会基于空气污染的考虑而取消买车行为。即使对于政府采取的“摇号”、“限行”等举措,不少人也是有微词或怨言的。而且,尽管开车只是部分人的行为,但受到污染的空气却具有公共性,因此也就赋予了污染危害的公共性,即空气污染之害一定会洒落到每个人的头上,当然也包括那些“无辜”者的头上。

那么,如何抑制破坏“公地”的私利行为呢?有两种现实的做法:其一,在可怕后果的“前景”反馈下,由政府等出面,强制遏制人们的私利行为,把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或人们能接受的程度,这是一种主动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和不满。其二,任由人们“集体堕落”,最后在可怕后果的“打击”下,如伴随着空气的污染而出现了较高或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于是人们要么自我自发地被迫抑制相关的私利行为,要么呼吁政府或某一社会组织出面采取限制措施以拯救环境。这是一种被动的做法。但令人深感忧虑的是,当今世界,人们在环境问题上普遍采取了这种被动的,即“见了棺材才落泪”、“撞了南墙才回头”的做法。

在当今人类的发展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四个“越来越”的现象。所谓四个“越来越”,是指人口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人口都想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结果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使越来越多“无辜”的人也深受其害。这四个“越来越”的现象,不仅中国有,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四个越来越”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是因,越来越糟糕的生态环境是直接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其害或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的“报复”性发生,则是次生性的反馈结果。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在其关于人类困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要求人类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当没有利用的可耕地很多时,就可以有更多的个人,每个人也可以有更多的粮食。当所有土地都已利用,在更多的人或每人更多的粮食之间权衡就为绝对的选择。”但遗憾的是,整个人类似乎并不打算做这样的选择,依然固执地沿着越来越多的人都要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的轨道向前发展,即便生态再脆弱、资源再枯竭、环境再污染也要“一条道走到黑”,但这样的发展,人类还有明天吗?

总之,“四个越来越”的发展现象充分说明了:其一,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荣损、一损俱损的互为影响的密切关系。换言之,人类善待环境其实就是善待自己。其二,要想推进绿色发展,缓解人与自然之间日趋紧张的矛盾关系,走出“四个越来越”的恶性循环,就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原则,调动并整合广大民众的积极力量,让人们自觉地参与到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去,通过约束或抑制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快速无序的递增或递进的势头,选择一条切合实际的适度发展之路,通过对前两个“越来越”的有效抑制,以缓解或克服后两个“越来越”的后果。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